

庄肃与虚无之际：试论《灵飞经》的书道价值及艺术想象

高若栋¹，陈广博²

(1.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香港 999077；2.北京民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 100000)

摘要：被广泛视为小楷重镇的《灵飞经》一札，在隋唐时代的书法殿堂中占据显要位置，其上承两汉岁月“隶变”之后的字体结构、魏晋阶段醉心倜傥的士林气质，杂糅长安宫廷楷书的端方底色，成为脉络多元、技艺叠成的文人佳作。也具备浓郁的神祇仪轨和严谨法度的特质，灵动收放之间，形成对道教伦理衍生与融合的镜鉴。其书法文本，为五代之后的抄经体发展、翰墨美学的演化，做出潜在贡献。而蕴积的书道思想，则呈现出古典中国深邃的“天人”意识，在虚实辨析里曝露“求索”精神，从绮丽幻梦内剖析“自然”传统，深入研究内在境界，或有利于重估或丰满其价值版图。

关键词：书道艺术；古典中国；灵飞经；人文哲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7.612

唐代讲究“书道”，书法上升至哲学层面，或有此称，其作为传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研究诞生于开天时代的《灵飞经》帖，就技法而言，能够窥见一脉不断继承、革故的经验线条，春秋汲取于青铜时代的钟鼎文特质，两汉继承自先秦的篆书古朴之姿，魏晋在“隶意”的方正基础之上开拓出更具性格和独立意识的书体，南朝帖学大兴，追逐韵律与飘逸，北朝则刀笔融铸，碑文深邃大开大合，最终数千年积淀，造极于此隋唐之际。就思想而言，书帖对于道教仪轨和经典经书的精神谱写、宫廷抄经体严谨规格与秩序感的显露、儒家所秉持“不逾矩”的人文约束的呈现、古典知识分子寄情天地神祇托付所愿的欲望，堪称一部特殊档案。其所蕴含的权利理念和美学概念，足以充作8世纪帝国文教事业和文人思虑形态的某个剖面。其关乎“天人之际”的勾勒和遐想，对于“虚实”世界的绘制和倾诉，创造出“隐避”与“出世”及“狂狷”与“功利”之间的深层思考空间，为后世的五代、两宋、元明的藏家与书法家均产生影响，承载着若干历史阶段或环境下的文心与人心。

一：法度与道心：承自汉魏的天人哲学

唐代小楷始于贞观，其狭义概念上的前身诞生于隋代开皇之世，而宏观层面追索脉络，则应当锚定在“文人法帖”的源头，即“钟王体系”之上。相隔四百余年，从《宣示表》《乐毅论》到《灵飞经》岁月变迁、文事斗折，小楷书体不断成熟和融萃，最终与文人身份的建构历程一同，抵达了璀璨的时代。楷书的发展路径，具备相当哲学化、多元化的特征，其象征的思想形态和附着的历史信息，也如同政治手或官修史书的某种副本或佐证，以更为艺术、抽象和深邃的方式呈现着古典文人发生信仰、仪态、伦理、道德观和精神寄托等领域的变化或延伸的过程。从字体结构和笔画细节窥探，由两汉隶书走向楷书的形态变化与过渡，由矮到长、由波挑至平直、由古质的工具属性更进一步转向精致、流利的艺术性，其背后所镌刻的世事印记，乃是汉帝国迎来末世，原光武帝时期出身豪强的勋贵势力，逐步转变为世代公卿的士大夫家族，联合以颍川、南阳为主体的河南地区，及魏郡为核心的河北地区诸官僚集体，形成权利高度集中、私有化且充分利用孝廉、察举规则为内部权利私相授受的庞大高级官僚体系。在三国中期，一种新形式的“世卿世禄”状态不断发展，最终在司马氏代魏之后，将中国历史推入了彻底的世族掌权的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此阶段转向、延展，伴随社会环境、地缘和权利的风向偏移或流动。

楷书的诞生，与如此的政治生态存在着重要联系，正如世家体系的发轫与蓬勃过程本身就不断出现对文艺事业、文化领域和文人集团的改造、塑形或引导，所谓“豪族儒化与士族化是文化与权力的互动与再生产过程”[1]的阐述，正揭开了以儒家为核心的学者群体、职业文官、世家集团之间围绕权利和发展的复杂而深厚的关系。被后世奉为“楷书之祖”的钟繇，出身豫州颍川的顶级官僚家族，其钟氏一门与荀氏、陈氏、韩氏及司马氏等并为河南世家集团的轴心，族中子弟尽数出仕，往来中枢朝野或外放刺史、州牧者不胜枚举，在社会文盲程度极高的时代，与政治权柄等同或更为集中和稀缺的是资源是，对于文化知识的掌握，及学术话语权的阐释能力。在彼时，

作者简介：高若栋（2003—），男，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从事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

陈广博（1978—），女，北京民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成都诗词楹联学会书法家，主要从事中国书法艺术研究。

书法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世家子弟的研习、探讨和创作,即便在同期的南方,吴国曾出现过民间实用书法从隶向楷的过渡倾向,但其主要发展因素仍然与参预东南机要的世家成员存在无法割裂的关系,诸如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张紘,即出身广陵张氏门下,作为举孝廉为官的世家子弟典范,与建业政权长期维系着极亲密的姿态,而笔横于隶、楷之间的诸葛瑾,则是徐州琅琊诸葛氏之后裔,在吴国境内长期被视为扎根淮泗的北方流寓官僚集团的代表。这种由上而下的书法变革影响,最终形成了自内而外的发展潮流,从世家官僚到职业吏属,再由吏的阶层流动向官办机构底层或半民间性质的匠人、书生之手,诸如《葛祚碑》及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中,所谓不知名或出处模糊的楷书碑文、简牍等文献的出现,正可解释此观点。

翻开《灵飞经》一札,字体小巧、玲珑细腻、四面出锋,这些特点并非楷书自肇始阶段即具备,而是历经数百年的漫长演化、融合的产物,其中世家文人为其所做出了重要的文化思想和艺术审美的铺垫。王羲之以行书闻名天下,但其与第七子王献之的楷书名帖,同样为世人所敬重。出身东晋顶级门阀世家的王氏父子,属于当下社会极少数能获悉甚至掌握庞大文化知识结构的文人,自曹魏所盛行的玄谈之风气、自两汉所蓬勃的儒学阐释与考辨都在他们的笔端有所呈现。诸如“竹林七贤”的风韵或“曲水流觞”的风雅,在多数百姓看来,属于远在天边的故事与传闻,但对于东床坦腹的王羲之而言,不过是族中前辈与同侪的往事,以及亲身经历的若干桥段。在此情况下,世家政治所缔造的“名士”圈层,在对“玄”的探索和“儒”的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楷书那些挺拔、空灵的美学质地,及其背后关于“中和审美范式(Balanced Harmony aesthetic paradigm)”[2]思想体系的继承和演变,几乎都能在魏晋及南北朝漫长的时间轴中窥探出答案。作为唐代尔后,饱受职业官僚和普遍士林群体所使用的书体,楷书集艺术与个性、使用和易解于一体,其几宗主要的思想脉络尤为重要,解构其发展过程,也正是侧面推敲古典知识分子的心理世界的塑造流程。

作为中国最根深蒂固的学术思想,儒家的潜在与显性价值俱为庞大,其精神体系几乎可以视作书法审美与文化世界观之母。早在青铜器时代向大一统文明的过渡阶段,祭祀物料、陪葬或日用器皿上具有浓厚装饰性意味的钟鼎文,便不断勾勒着“礼”的概念,在书法的原始雏形上,所谓“儒”的核心意识便深度嵌入。在战国后期,孔子所谓“释礼归仁”的主张愈发得到尊崇和延伸,诸子百家的角逐与争鸣使伴随书体的演进,愈发成熟和完善。抵达两汉时代,儒学价值开始高度政治化发展,与中枢权利、朝廷要旨、统治逻辑之间展开深度合作或互涉及,而书法在篆、隶之变中,也不断被赋予官僚行文的意味,在个性化的纯粹艺术书体被广泛开创和接受之前,公文书体是后世多数书法脉络的“祖源”之一。因此《灵飞经》也并不例外,能够窥见,其行文的秩序感与庄严意味,将外在的规矩、仪式性的讲究,转化为内在的某种心灵的自觉和顿悟,将“立象以尽意”[3]的高深之处显露而出,古典中国的重要艺术表达特质,即是对外在现象、物事的消化与解构,使其成为内蕴的气质、精脉性质的产物,因此托世相于笔画,寄情绪于墨汁,或可视为书法概念的深层次的哲学化价值。汉代尔后,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形态,成为多数书帖作品所携带的“文化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4]的内涵的核心内容。而在两宋及以前,具备浓厚文哲阐释价值及文化承载力的书法作品,习惯被称之为“书道”或“书学”(此名后为东洋人所借重,发展为日本文艺领域的重要概念),其道统之所载、学问之所植,与“宇宙论、本体论”[5]等儒家理论关系密切,在圣人之终极理想、天下之凝一精神、文人之太平愿景和功名欲望之间,书帖成为一种明证。

在儒学之外,驳杂丰富的天人关系,则是楷书发展及《灵飞经》书帖的另一层至为重要的思想源泉。在2世纪后,汉室崩塌,数十年后晋室再度沦亡,寰宇陷入激烈动荡,北中国混乱如云,南中国勉力偏安,直至进入南北朝时期,整体局面方才步入相对稳定。而正是在上述紊乱演变状态之中,人文思想、哲学与书法艺术却在时代的激流中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发展契机,看似碎片无序的价值乱局,实则推动了多元融合的路径诞生。一种被拓宽或改造后的“华夏视野(Sinic perspective)”[6]在书道中被塑造。传统的“天人”意识主要依托史学脉络展开,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7]的最终追求,是完成“一家之言”的创设,而如此的“天”与“人”的价值联通,尚处于个人与自然、个体与世界的单项交涉或仰望之间,史学家的孤独和倾诉欲在其中得到满足,但并不足以解释或赋予艺术家的思想世界的建构逻辑。在魏晋的玄谈之风后,对经典儒家的肃穆、庄严的秩序大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松动,夫子所谓“敬鬼神而远之”的主张,逐步被网罗着诸多咄咄怪事的谈天说地之氛围给替代。在南方士林的圈层中,对于“天”的理解早已超乎了所谓的“帝王专利”,当君权可以与神权沟通,或代“天”的代言角色时,若干文人也开始与“天”产生若即若离的想象或解读欲望。在南朝华丽飘逸的文化风气中,天人关系成为一种可以私有化的精神自治的空间,或用来隐匿志趣、逃避一些现世不可言说的内容,或可以当作理解自然的某种渠道,将“天人”的尺度拉伸到山水、湖泽与人心之间的宽阔距离上,桃花源的故事,或陶潜的归园田居时机,都可以视之为“天人关系”的现实表达。书法上,正如蔡邕在《九势》所谓“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尽矣”[8]的说法,书道的精神的源流之一即肇始于自然之间,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灵飞经》时,那股往来山林、街衢的介乎于俗世、混沌和隐世之间的笔触,正是继承于前代数百年间开拓发展的经验。

而更丰饶和宏观的“天人合一”之境界，则是4世纪至7世纪之间的因宗教思想融汇交流产生的新生态的产物。当《灵飞经》与张旭的《古诗四帖》、李邕的《麓山寺碑》及李隆基的《石台孝经》等作品共同构成所谓“盛唐气象”之时，其中所大量包含的飘散、自由、升腾和灵动的精神气脉，根源便在于前数百年的天人观、文人意识形态的转化扩张。早在汉末，道教的崛起便引人注目，官府治乱世惯用重典和苛捐，而以张鲁集团为代表的道教势力，则多力主调和人心、施恩明令的方式，在政治之外更注重精神层面的驾驭或引导，让飘忽虚无的神祇与现实中存在的即效权柄高度融合，因此汉中地区的数万户百姓，对于道教统治模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心悦诚服的人身依附或价值寄托的情感。道教将道家所谓“无为”与“逍遥”的价值联通过天与人的双向绑定概念上，在困厄的俗世，为修道之人指出一条似乎可以抵达长生、极乐之地的路径；在威权笼罩的社会体制之下，为渴望享受自由和博取独立价值的文人，提供了逃避现状的意志指南。在《灵飞经》中“何虑何忧，逍遥太极，与天同休”[9]的字样屡见不鲜，其内容本身便是道教经典，具备浓厚的关乎“天人凝合”的价值倾向，在对于世间忧虑的排除或消磨基础上，不断提出与“天”产生共鸣，乃至共生的思考。将普遍的“制天命而用之”的“知命”逻辑，转变为“通天下一气”或“道通天地”的“改命”思维，某种重构世界观念和格局的力量，成为道教赋予“天人关系”在思想上的最大贡献。而其具体技巧上对于“大巧若拙”[10]的追求，最终促成道教符篆书体的部分特色，与传统楷、隶书帖之间产生互涉和熔铸，如《灵飞经》一般的抄经体作品，便堪称兼具宗教功能和普遍审美价值的范式。

二：飘逸与藏锋：薪传宋明的人文卷轴

总体而言，南朝对于儒、道、释之间的融合与探索，相对稳定与温和，佛教思想虽时常浸润其间，乃至偶然出现萧衍奔入同泰寺的闹剧，但始终未能取得对整体文化方向具有强烈影响性的地位。而在北朝，这一局面则大为改变，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其汉化进程中不断显露着对于佛教信仰的尊崇，或许是儒学与道教过分鲜明的中土属性令游牧贵族产生一定程度的疏离或不适，而在草原、汉地、西域乃至更广阔的泛中亚、北亚地区都有所传播的佛教，让平城、洛阳的贵胄更觉亲近。最终的局面即是佛陀的思想在黄河流域大肆铺展，影响深远，对隋唐时代的社会文化乃至不同阶级的艺术审美，都产生着持续的波澜。在书道之上，北朝文人多笔力刚健、直硬，在碑文作品上成就极高，思想上接受犍陀罗等艺术品类的输入，对于大巧不工的缘起性空、慈悲观照等雕刻艺术特质有所吸纳，同时佛教所赋予的一种藏锋、包容和平视的姿态与氛围，对“尽心—知性—知天”[11]的中国古典哲学体系进行了有效补充和丰赡。魏室分崩之后，定都长安的政权很快为北周所取代，而周室之政治核心势力即关陇集团，高度重视禅学价值和儒道的汇通，因此隋唐所谓盛世的文化图景中，那股愈发强大而不可忽视的佛教意识的身影，便并非无根之木，而是有所渊源的继承发展的结果。在《灵飞经》诞生的开天时代，儒、释、道三家对“天人合一”都“有所发明、发展”[12]，呈现出儒学占据主要文化意识形态，而佛与道受到上至贵胄下至平民的普遍尊崇的态势，神霄宝殿与极乐世界在长安城中，达成一种微妙的文化平衡和共事关系。

佛学潜移默化地赋予唐代小楷的圆融、内敛的气息，在《灵飞经》中有所体现，并非如同近现代若干学者所一味强调的轻切入纸、似风入林的锋芒特质，在书帖内对于呆板、迟滞问题的抑制或超越，更多依托相对温润的转折之法，以及内在造化的玄妙，这是藏锋与出锋并重的结果，绝非单纯的直锐、锋芒能够造成的状态，以笔为刀刃从来不是稳妥之法，对于盛世时期的抄经体而言，清雅气脉的连贯，需要讲究既飘逸又富于内涵的妙趣，怀有骨节与韧性，但不能为极硬质的棱角所控遏，成为失去风度的刀笔吏之作。正如仲芳所指出“之前的研究多关注唐之大楷”[13]一般，大楷在精密程度和圆融之气上，与《灵飞经》为代表的小楷多处呈现形如两方天地的差异，用大楷之视野料定小楷之气韵，实为历代惯性使然的通病。作为开明、开放时期所诞生的书道作品，《灵飞经》也很难仅以单向的文化意识去归类，更无法仅凭其道教经文的内容缘故，便笃定其仅受三清殿下的熏陶，是为一宗之产物，而忽略客观的现实情况，在玄宗统治中前期帝国臻于极盛，文化多样性的特质填涂大唐的诸多领域，无论诗词歌赋或书道、茶道等。从禅意等艺术角度剖析唐小楷的潜藏价值，或是勇开新门的举措。

除却书帖的艺术特质解构，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其身世的谜团。时至今日，学界仍然不能断定《灵飞经》究竟诞生于何人之手，传世的帖子惟有明清两代的篆刻、临摹版本。原帖遗失的因素为这部书帖的身世又添疑云，谢恭铭、启功等书家亦困扰其中。目下学界，或依从袁桷在其著作《清容居士集》卷四七《题唐玉贞公主六甲经》中给出的观点，即“审定为绍京无疑”[14]的论断，但同时也存在广为流布的“无名小吏（经生）”出处说法，这样奇绝斗折的故事，对于一幅名帖而言是相当罕见的。在汉文化圈内，无论是中国之黄庭坚、蔡京，朝鲜半岛之韩石峰、白云和尚，日本之嵯峨天皇、桔逸势，但凡名家名作几乎不存在名篇与作者产生关系悬案的情状，偏偏是“为世所重”的《灵飞经》在千百年间陷入了这般境地。因此当分析其书道思想与文化意识之时，两条有所不同的路径的产物被呈现而出，其背后也暗喻着书帖遗泽后世的不易觉察的价值。

关于“钟绍京书”的学说，由来已久，作为拥有钟繇后裔（明代《兴国县志》及清代越国公碑文考据其为第十七世孙）身份的文人，似乎自带书道领域的族谱光环，享有后世较高的评价和敬畏。同时因为其政治地位的特殊缘故，在唐代赐爵封公、位列中书门下的履历，时下有“江南第一宰相”之称，及“开元时书家第一”[15]之赞（或为自诩），备受官僚士林的推崇，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按照《灵飞经》诞生的时间判断，应处于钟绍京

之暮年光景，这位波幅不断的宦海人物，创作出如此风姿绰约的书帖，似乎是雄心未老的一种旁证，在“洞真部神符类”[16]的仙境遨游中，超越年少时“致君尧舜”的理想抱负，在龃龉旋转之间泼洒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怀，书帖之于他而言虽是随手小札，却也是倾诉欲的某种体现。如此孤独的潇洒、寂寞的飘逸、沉痛的锋芒，在笔端聚散来回，后世人多沉湎现象，而非看穿其内核，为细腻和惊艳所倾倒，仿佛目睹一得势文翁的纵意，却未解其履历坎坷、事业浮沉后复杂的心境。

作为曾经玄宗最为倚仗的亲信、潜邸的嫡系，当钟绍京在《灵飞经》享受鬼神符篆之说、追逐修仙飘渺之意的时刻，已然心思落定，从职业官僚再度回归“在野文人”的状态。历经开元时代驳杂的党争、派系倾轧、相位轮替，在长安的中枢席位几进几出，痛苦、得意的经验过分丰沛，在晚期康养岁月中，他几乎不可逆地向往着“天人学说”的蓝图，前代所勾勒的“天人追求”被转换为某种无为或轻逸价值的糅合体，其类似古希腊哲人的“*physis*”[17]理论，通向高度的“自在”之境。这种精神资源，几乎可以视作中国文人数千年间无可规避的一种价值向往，在“隐”和“退”、“求”与“进”的命运关隘之间设置出“虚”与“止”的选择，这种包含着“消极主义”的探求路径，本质上正是人心与艺术两难局面下的产物。残唐五代之后，宋明时期的文人，将如此文化审美，融入了“度象取真”[18]的思考内，以安置那些在官宦裂隙、山林忧虑之间的摇摇欲坠的心绪，通过庄严、肃穆的书帖，誊抄、奔向可预的“虚无”追求之中，实是一种脆弱而足可理解的幸福。在帖子里，钟绍京写“流真曲降，下鉴我形”的感慨，正是对排除纷扰后以“天”鉴“人”的渴望，剖出内心，在度过了诸多世俗苦痛、灾难与恩宠之后，所谓理想国般的不朽之世，一种奢侈的美好的幻梦，萦绕心头。

而关于“无名经生书”的学说，则析出了另一层更具平民意识、世俗属性的艺术思考，其似乎也代表了唐代抄经体与北宋院体画的某个隐秘的共性，即是内容（主要意识形态和审美理解）虽不受创作者所掌控，主要服务于当权集团，但结合其历史背景及延伸思考，可以想象或推断出潜在的更生动化的思想曲线。正如杜维明与泰勒（Charles Taylor）在探讨世俗社会问题时，所谈及的难以维护“完全无利害关系的立场”[19]的观点，在唐代受雇或服从于皇权机构的经生小吏，也在潜意识里难以完全保持对上层价值的领悟和贯彻，难以完全抑制自身意识的掺入或情绪的渗透。在书道中，作者、作品、艺术世界，三者之间所构成的关系具备相当的私密或专属特性，其中的不可干预价值，长期受到关系之外的视角的低估，正如社会学研究所谓“直接把‘我’和‘世界’的关系公开地伦理化（Ethicization）”[20]的思考一般，在书帖之内，作者的主观情绪、世界理解（尤其是最朴素和庸常的生活情调）会以不定的、潜移默化的状态隐约浮现在作品之间。对于经生而言，那份作为上层任务、誊抄要求的《灵飞经》篇目，将不只是崇尚道教的李氏王朝一众官僚贵胄所求的文化氛围的产物，对政治长生、肉体不朽、权柄永存愿望的烘托，其也是经生自身笔端存有希冀的结果，在人间法度与虚空想象之间突破制约，获得片刻虚实之交的慰藉。

经生手畔的《灵飞经》，将“中国人文之妙，宅心之深”[21]曝露出一个崭新的，或此前罕有注重的价值空间，即是百姓、平民阶层的书法创作、书道精神。所谓中国人文的深厚，在历经秦汉时代的贵胄政治、魏晋及南北朝的世家政治、隋唐的官僚政治之后，逐步在宋明时期走向更广泛的境地，唐晚期所谓“诗余”的“词”形式开始出现，两宋时代“札记、笔记”以小说的“先声”开始流行，直到明清时期，百姓对于切实的文化事业直接的潜在或主观参与度愈来愈高。中国人文精神的发展路径，总体上也可视之为从小圈层走向大众，从集中的、精英的产物走向共同的、普世的价值趋势。而作为8世纪社会芸芸一员的无名经生，在《灵飞经》的出锋、斜捺之创造时，正隐隐揭示这一宏大的历史流向。

他对于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有机结合，在油盐醋茶中寄托自身的希冀。从“行此道，忌淹污”等具备典型规矩和戒律特质的辞藻之下，透露着一个在尘世中生存，却渴望得道飞升者的形象。在具备崇道修仙之风的国度，如此的凭书帖以寄托心愿的举措，在贵族之间屡见不鲜。但三清殿的丹陛之下，静心抄录的身影，却也可以是一个在史册甚至未留下姓名的黎庶。那些结体紧密而不局促的文字，正从中心收紧而长横、长捺向外舒展的字词之中吐露着一个宏大时代之中普通人的心思，经生的克制与谨慎让《灵飞经》并不放纵自身荡漾在盛唐荣光中恣肆疯狂，那些笔画上的凹口、波折、短挑，拥有清朗而平实的魂魄。经生不会有钟绍京般的政治诉求，在朝堂之上纵横捭阖，与帝王交集、执掌揆位，他甚至毕其一生可能不曾拥有过靠近坊市的紧凑屋宅，不曾翰林院的千古文章之上瞭望前一千、揣测后五百载，他留下的笔迹单纯、劲道、有节，在静谧与虔诚的心绪中追求一些略高于生活的乌托邦场景，随后撤下帖子，又返回柴米的生活之中去了，全然不会料到为后世千年留下了一桩可爱又可敬的书法悬案。

钟绍京与无名经生所各自演绎的故事，以及其中共生的谜团，似乎正解释了“美”的丰富性和包容性，以及“美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2]的缘故。一札《灵飞经》如同宕泉河畔、敦煌窟中的藏书，千百年斗转星移，而文字依旧、风范依然，让今人追随乃至超越其气质，与字符里魏晋行走的马弁、撇捺中隋唐行吟的侍郎，以及身世迷离的若干文人相会、同行。最终通过艺术的想象和道统的追索，凝望自己。

参考文献：

- [1] 崔向东. 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以关东豪族为例[J]. 社会科学战线, 2011(1): 110 – 110.
- [2] Zhang Xin, Chen Jian. The Expression of “Balanced Harmony” Aesthetic Paradigm in Aesthetic and Artistic

- Concepts[J]. *Journal of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4, 38: 213 – 218.
- [3] 左吉龙. 中国书法中阴阳思想的体现——以王铎行书条幅书法为例[J]. *戏剧之家*, 2016(7): 258 – 258.
- [4]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纳日碧力戈,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5 – 5.
- [5] 陈来. 宋代理学概要[J]. *河北学刊*, 2023(4): 62 – 62.
- [6] 梁永佳. 中西之外: 华夏世界观与人类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 295 – 295.
- [7] 汪春泓. 从《文心雕龙》《文选》视角详析司马迁对于“文”的认识[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1): 107 – 107.
- [8] 徐慧极. 魏晋艺术体势论——以《文心雕龙·定势》为例[J]. *民族艺术研究*, 2019(5): 13 – 13.
- [9] 启功, 刘涛, 主编. 中国书法全集·第9卷(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写经卷)[M].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1993: 142 – 142.
- [10] 王东辉. 道法自然, 书尚天成——浅析道教书法艺术[J]. *中国书法*, 2020(11): 76 – 76.
- [11] 康中乾, 王有熙. 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天人合一”的五种思想路线[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 43 – 43.
- [12] 张涛. 《周易》与儒释道的“天人合一”思想[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4): 144 – 144.
- [13] 仲芳. 浅论钟绍京及其《灵飞经》的地位[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5(12): 182 – 182.
- [14] 胡迪军. 唐人小楷《灵飞经》的前世今生[J]. *书法*, 2016(12): 140 – 140.
- [15] 凌天明. 钟绍京书史形象述考[J]. *中国书法*, 2019(10): 62 – 62.
- [16] (明) 张宇初, 主编. 正统道藏: 第一册[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875 – 875.
- [17] 李博. 自然与人为: 道家与儒家的思想原点[J]. *文史哲*, 2024(2): 149 – 149.
- [18] 沈沫. 论中国古典美学的理论演进——以文人绘画为例[J]. *哲学研究*, 2025(3): 159 – 159.
- [19] 杜维明,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邱楚媛. 世俗时代的精神图景[J]. *社会科学文摘*, 2023(3): 22 – 22.
- [20] 费孝通.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3): 14 – 14.
- [21] 钱穆.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278 – 278.
- [22] 王一川. “美”与“文”的游移——宗白华美学阅读札记[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6): 68 – 68.

The Interstice of Solemnity and Void: An Exploration of the Calligraphic Value and Artistic Imagination of Ling Fei Jing

Gao RuuDong¹ Cheng GuangBo²

(¹ Hong Kong Academ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ong Kong, China; ² Beijing Minyi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e "Lingfeng Jing" manuscript, widely regarded as a masterpiece of small regular script, holds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calligraphic pantheon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t inherits the character structures post-"cler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Han dynasties, the unrestrained elegance of the literati ethos during the Wei and Jin periods, and blends the dignified foundation of Chang'an court-style regular script, forming a work of diverse lineage and layered craftsmanship. It also embodies the profound ritual symbolism and rigorous formal discipline of divine rites, creating a reflection on the deri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aoist ethics through its dynamic interplay of restraint and liberation. Its calligraphic text contributes implicitly to the evolution of copying styles and the aesthetics of ink art in the post-Five Dynasties era. The accumulated calligraphic philosophy reveals the profound "human-nature" consciousness of classical China, exposing the spirit of "inquiry" through the discernment of reality and abstraction, analyzing the tradition of "nature" within its ornate dreamlike imagery, and delving into the study of inner realms—potentially enriching or reevaluating its value landscape.

Keywords: Calligraphy Art; Ancient China; Lingfeng Scripture; Humanistic Philosophy